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 韦庆媛

摘要 收集、整理民国时期个人、机构对图书馆数量的历次调查统计,以及中华图书馆协会留下的会员统计表,对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数量、图书馆员人数、图书馆学者的群体规模及地域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图书馆学者的区域分布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受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者群体曾通过提案,影响国家决策,使全国图书馆区域分布失衡的状况有所改善;也有个别学者以个人魅力凝聚同行,带动一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国家调控是平衡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者群体分布失衡的必要手段。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图书馆数量 图书馆员数量 区域分布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7.02.016

1 民国时期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者的规模

1.1 民国时期图书馆的数量

抗战前全国图书馆的数量达到民国时期的顶峰,但究竟全国有多少图书馆?统计主要来自个人和机构。最早对全国图书馆进行调查的是沈祖荣先生,他在1918年发表的《中国各省图书馆调查表》中,收录了全国33所图书馆^[1]。1935年许晚成作《全国图书馆调查表》,以个人之力调查颇费周折,“或一馆而探问数次,或一疑而悬候累日,远道通函调查,往往发函十数次,而总无复寄,挂号快函,如雪片飞去,亦有始终不睬,切托该地友朋,实地探问,始达目的。”最终收录图书馆2520所,包括公立图书馆2005所,私立图书馆515所,“所列图书馆,皆以有固定名称及组织,并有相当人员管理者为限,一橱一桌可称图书馆者,概不列入。”^[2]同年,杨家骆以个人之力,积几年时间、几万封信调查所得,全国有2940所图书馆^[3]。

机构主要是通过向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发放调查表进行调查,数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二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三是浙江图书馆和上海《申报年鉴》社。各方统计标准不同,数量出入也较大。

中华图书馆协会在抗战前共进行了5次调查。1925年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是民国时期最权威的全国性图书馆专业学术团体,协会成立后,为了解全国图书馆的情况,即请各省教育厅配合,着手调查图书馆的数量。1925年10月发表了第一次调查结果,全国有502所图书馆^[4]。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各省行政刷新,新创立的图书馆增多,1928年10月中华图书馆协会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全国有641所图书馆^[5]。1929年12月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全国有1428所图书馆,其中国立、省立、市立、县立、私立图书馆925所,学校附设图书馆387所,机关会社附设图书馆74所,专门图书馆(主要是儿童图书馆)41所,此次调查因没有收到山西、江西、湖南以及边远省份西康、宁夏、青海、新疆、蒙古、西藏等省的调查报告,因此数据并不完整,但图书馆还是增加了很多,这主要是因为1929年1月在南京举行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全国影响很大,政府也加大倡导力度,人民对图书馆有了更多的认识,使全国新创立的图书馆增多^[6]。1931年12月中华图书馆协会进行了第四次调查,全国单设及较大图书馆共1527所,计国立、省立、市立、县立、私立970所,学校附设413所,机关会社附设89所,专门图书馆

*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研究”(项目编号:15BTQ003)和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15ZHB017)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韦庆媛,ORCID:0000-0001-6505-0007,weiqy@lib.tsinghua.edu.cn。

(主要包括小学及儿童图书馆)54所^[7]。1934年12月进行第五次调查,全国公共图书馆(包括国立、省立、市立、县立、私立和儿童图书馆)933所,学校图书馆(包括大、中、小学图书馆)497所,专门图书馆(包括专门学校、政府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377所,特种图书馆(指外国人用者)9所,共1816所,加之民众教育馆附设的图书馆1002所,全国共2818所,但规模太小之阅书报处没有列入^[8]。历年调查统计显示,图书馆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新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另一方面是协会虽与各省教育厅配合,但仍存在调查渠道不畅、信息滞后等问题,需要不断补充遗漏。

另一个调查途径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据1930年调查,全国有2935所图书馆,其中普通图书馆903所,专门图书馆58所,民众图书馆575所,社会教育机关附设图书馆331所,机关及团体附设图书馆107所,书报处259所,学校图书馆694所,私家藏书楼8所^[9]。这一数据与中华图书馆协会1931年的调查数据相差较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是以单设图书馆和较大型图书馆为主进行统计,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统计包括了大量的民众教育馆附设的图书馆及规模较小的阅书报处等。1936年9月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再次进行全面调查,基本延续上次的标准,更将数量大大提高,全国有4032所图书馆,其中普通图书馆573所,专门图书馆11所,学校图书馆1963所,民众图书馆1255所,流通图书馆37所,机关图书馆173所,私家图书馆20所^[10],该调查的覆盖范围较广,如民众图书馆包括通俗图书馆、乡村图书馆、农民图书馆;流通图书馆包括巡回文库;机关图书馆包括政府机关、团体、工厂、商店等附设图书馆,因此数量较多。

1931年浙江省立图书馆进行全国调查,列出1421所图书馆^[11]。上海《申报年鉴》社从1933年开始,联合浙江省立图书馆连续4年对全国图书馆进行调查。1936年该社联合浙江省立图书馆制表分发各省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调查,并参酌中华图书馆协会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统计数据,确定全国28省6直辖市、区(包括已沦陷之东北三省,但未包括西藏和外蒙)有单设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学校、机关附设图书馆共5196所,其中单设图书馆1502所,民众教育馆附设图书馆990所,机关附设图书馆162所,学校附设图书馆2542所,这一数量多于同

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调查的4032所,该社的解释是“意度教部发寄调查表时对于各类标准未经明定,故各省造送取舍无定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学校图书馆,该社“根据教育部中等、高等教育统计,默认为每一中等以上学校必应有一相当之图书馆,故不尽从其他报告”^[12]。

个人调查和机构调查相比,机构的调查可信度更高一些。从调查途径来看,个人调查在获取信息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许晚成、杨家骆的调查虽颇费周折,然比之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以及浙江省立图书馆和上海《申报年鉴》社的调查,图书馆数量少了很多。而官方的调查是通过向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寄发调查表获取数据,获取数据的途径更为直接有效。

在机构调查的三种途径中,数据相差也很大,哪一种更为可靠?笔者认为,从数量上来看,以浙江省立图书馆和《申报年鉴》社联合调查所得5196所为最多,该调查在回收调查表的基础上,详细参酌比对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调查资料,补充不足。《申报年鉴》社还编制了《中国各省市立图书馆概表》、《全国重要大学图书馆概表》等,包括馆名、地址、藏书册数、全年总经费、组织、馆长、馆员、成立年月等信息^[13]。该调查的缺点是,尽管教育部规定中等以上学校须设立图书馆或图书室^[14],但未经实际调查,仅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等以上学校的数量来确定图书馆的数量,未免武断,但应与实际出入不大,数据可以作为基本参照。1948年教育部在编制《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时,也采信了这一数据。1948年全国仅有2702所图书馆,与1936年相比,数量大大减少。^[15]

1.2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员人数

在确定了图书馆数量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即民国时期究竟有多少图书馆员?

据1931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统计,全国有2935所图书馆,馆员3528人,平均每馆1人多一点^[16]。另据1935年许晚成的调查,全国有2520所图书馆,馆员5143人(个别图书馆馆员缺失)^[17],平均每馆约2人。

来自官方的社会教育统计数据也基本反映了这一规律。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感于各国社会教育之发达,而我国年长失学之人占全国之大多数,以此立国,危险孰甚!因竭力提倡社会教育,而于草拟教育部官制时,特设社会教育司,与普

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18]。蔡元培将教育分为校内和校外两种形式,学校教育包括大、中、小学校开展的正规教育活动,社会教育包括在学校之外的图书馆、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博物馆、民众茶园、补习学校、识字班等教育。社会教育司掌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通俗教育及讲演会、巡行文库等,图书馆主要包括国立、省立、市立、县立、私立等公共图书馆,据教育部统计,1930—1945年全国社会教育机关图书馆及馆员人数见表1。

表1 1930年至1945年图书馆数量及图书馆员人数统计表^[19]

时间(年)	图书馆数(个)	馆员人数(人)	时间(年)	图书馆数(个)	馆员人数(人)
1930	1273	2648	1931	1393	2885
1932	1479	2748	1933	1634	3209
1934	1479	3001	1935	1576	3204
1936	1848	3553	1937	1123	2245
1938	1178	1935	1939	1003	2156
1940	892	1751	1941	1066	1660
1942	1135	2245	1943	940	1808
1944	706	1498	1945	704	1511

1930—1945年社会教育机关图书馆的数量和图书馆员的人数是动态变化的,抗战前的1936年达到顶峰。此项统计不包括学校教育所涉及的图书馆,但统计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馆员人数的参考,以1936年为例,社会教育机关图书馆为1848所,馆员人数为3553人,从比例上看,馆员约为图书馆数量的二倍,其他年份也基本如此,因此可以推算每馆至少有2名馆员。而当年全国有5196所图书馆,以此判断,全国至少有馆员1万人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全国图书馆的总数并不是社会教育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的简单相加,如单设图书馆中也有非公共性质的图书馆。

1.3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的规模

一门学科的建制有三个主要的标志,即建立专业系科并开设相关课程或系列讲座、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出版学术刊物^[20]。值得图书馆人自豪的是,1920年已经在文华大学创立图书科开始专业教育;1925年成立了专业学术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1926年创办了图书馆学术刊物《图书馆学季刊》;在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学已经完成了学科建制,确立了学科地位,早于现在公认的一些重要

学科。

成立专业学术团体是完成学科建制的重要标志。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宗旨是:“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协会会员在统一的学术共同体内,开展学术交流,探讨学科发展的专业问题,确认学科成果,提升对图书馆学的认同和信念,形成了一个学者群体。1925—194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共举行6次年会,出版了期刊、丛书、调查报告等,还积极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的活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发展,是学者群体集体推动的结果。对图书馆学者的评定标准是多元化的,作为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形式的学术论著,是评价学者学术水平的主要依据,学术成果的作者群体是图书馆学重要的学者群体。但是,图书馆学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图书馆学者不仅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著,而且还借助中华图书馆协会这个平台,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前瞻性的工作提案,会员中不仅有图书馆学家,还有长于图书馆管理的专家,他们是各地图书馆的代表,具有高度的专业自觉性,他们把协会的精神带到各地指导工作,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他们更能代表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多样性,因此本文主要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作为学者群体进行研究。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是民国时期基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中华图书馆协会采取会员制,会员分为四种:一、机关会员,以图书馆为单位;二、个人会员,图书馆员或热心图书馆事业者。三、赞助会员,捐助该会经费者(后期增加了永久会员)。四、名誉会员,在图书馆学术或事业上有特别成绩者^[21]。历年的会员数量统计见表2。

表2 中华图书馆协会历年会员数量^[22]

年份(年)	机关会员(个)	个人会员(人)	名誉会员	总数
1926	129	202	33	364
1927	132	217	31	380
1928	129	190	31	350
1929	162	269	29	460
1930	173	273	35	481
1931	186	310	33	529
1932	233	402	32	667
1933	258	452	30	740

年份(年)	机关会员(个)	个人会员(人)	名誉会员	总数
1934	277	482	27	786
1935	276	522	27	825
1936	288	536	26	850
1939	81	193	24	298
1940	101	280	22	403
1943	142	417	18	577
1944	157	535	18	710
1947		709	8	717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数量也是动态变化的。协会成立后,在业内的影响力和认同度逐年提高,抗战前会员人数呈逐年增多的趋势,1926—1936年的10年间增加了2倍多。但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图书馆纷纷内迁,混乱的局势也使会员联络不畅,统计工作一度中断,1939—1940年左右,会员人数骤减,抗战后期逐渐恢复,1947年达到个人会员人数的顶峰。

中华图书馆协会聚集了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最优秀的学者,1936年全国有图书馆5196所,馆员1万人以上,当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有个人会员536人,仅占馆员总数的5%。1948年全国有图书馆2702所,按照馆员为图书馆的倍数计算,约有馆员5400人以上,而1947年底协会有个人会员709人,占馆员总数的13%,图书馆员参与学术活动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协会会员是图书馆员中的先进群体,也是图书馆界的代言人。

2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

2.1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地域分布

中华民国建国初期承袭清朝旧制,辖有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22省。北洋政府时期,在原22省的基础上,增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等几个特别区域。国民政府建立后,将特别区域和宁夏、青海一同建为6个省(其中川边特别区改制为西康省),总计28个省,另外加上西藏、外蒙古2个地方。1945年后,国民政府将东北三省划分成九省,增设辽北、安东、合江、松江、嫩江、兴安6省,抗战胜利后接收的台湾,成为第35个行省。除设省外,民国时期共设置了12个直辖市,1927—1928年

设南京、上海、北京^①、天津为直辖市,1929—1930年设汉口、广州、青岛为直辖市。抗战爆发后,1939年随着政治中心转移,设重庆为直辖市。抗战胜利后,为了加强对西北、东北的控制,设西安、大连、哈尔滨、沈阳为直辖市。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构成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界基本的学者群体。1926—1947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分别于1926年、1931年、1935年、1939年、1947年公布了5次会员调查结果。1926—1935年的3次调查,学者群体的区域分布基本相同,以统计人数最多的1935年为例,个人会员507人,国内490人,国外17人,国内会员分布在19个省、5个城市,将仅有3人的青岛市归并到山东省,学者地域分布情况如下:

表3 193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个人会员的地域分布^[23]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北京	111	南京	73	上海	53	天津	22
江苏	31	广东	30	浙江	29	湖北	26
河北	25	福建	16	山西	15	安徽	13
山东	12	四川	9	广西	7	河南	5
江西	3	陕西	2	湖南	2	云南	2
辽宁	2	绥远	1	贵州	1	美国	12
瑞士	2	英国	1	法国	1	日本	1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组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委员会,下设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及各分委员会,委员由会员公选,均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学者,是民国时期图书馆的核心学者群体。以1935年为例,协会设立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事务所、分类委员会、编目委员会、索引委员会、检字委员会、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建筑委员会、编纂委员会、版片调查委员会、图书馆经费标准委员会、审定杜威分类法关于中国细目委员会、《图书馆学季刊》编辑部、会报编辑部,聘请委员120人次,去除职务重复者,共64人,其地域分布情况见表4。

表4 193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领导机构成员地域分布^[25]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北京	16	上海	11	南京	12	天津	2

^① 1928年北伐军占领北京后,将北京改为北平,全国解放后,又改为北京。本文为行文方便,统称为北京。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湖北	2	浙江	2	江苏	2	广东	2
山西	2	四川	1	河南	1	江西	1
山东	1	福建	1	美国	6	英国	1
法国	1						

中华图书馆协会名誉会员是在图书馆学术或事业上有特别成绩者,分为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历年国内名誉会员均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几个大城市,以1935年为例,共有名誉会员27人,国内19人,国外8人。在国内的名誉会员中,除施肇基属于南京政府官员,当时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住在伦敦外,其余全部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任职或居住。

表5 1935年国内名誉会员地域分布^[26]

城市	人数	城市	人数	城市	人数	城市	人数
北京	6	上海	6	南京	4	天津	3

193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进行了抗战爆发后的首次会员调查,因受战争阻隔,统计不全,上海孤岛包括在内,北京、天津为沦陷区,未在统计范围之内,国内会员分布在13个省、2个城市。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的图书馆陆续迁回原址,图书馆开始恢复原有秩序。1947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全国会员进行调查,个人会员有709人,国内682人,国外27人,国内会员分布在21个省、10个城市。按现行行政区划习惯,将会员较少的西安、广州、沈阳、汉口、青岛归并到城市所在省份,其地域分布见表6。

表6 1947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地域分布统计^[27]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南京	177	上海	93	北京	62	重庆	27
天津	12	福建	65	四川	50	浙江	49
江苏	19	湖北	18	广东	16	江西	15
陕西	13	安徽	9	广西	8	云南	8
辽宁	7	山东	7	湖南	6	山西	6
贵州	6	甘肃	6	河南	4	台湾	3
西康	2	河北	1	吉林	1	美国	22
瑞士	4	澳洲	1				

抗战期间,由于通讯阻隔,协会会员分散各地,协会各专业委员会活动基本停止,但协会领导机构始终坚持工作,1944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在组织参加中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三届联合年会的同时,举行了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六次年会,重新选举理事、监事委员会委员,加上协会事务所成员共25人^[28],这次选举出的协会领导机构一直延续至1948年,据1947年统计,协会领导机构成员的地域分布见表7。

表7 1947年中华图书馆协会领导机构成员地域分布^[29]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南京	8	北京	2	上海	1	湖北	3
浙江	2	甘肃	2	江苏	2	广州	1
四川	1	美国	3				

抗日战争胜利后,协会部分名誉会员迁徙他处,部分年事已高,相继逝世,1947年仅有8位名誉会员,其分布见表8。

表8 1947年国内名誉会员地域分布^[30]

城市	人数	城市	人数	城市	人数
北京	3	上海	2	南京	3

2.2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4类分布区

综合中华图书馆协会1935年和1947年对会员学者的调查结果,可将其分布划分为四个区域。

(1)密集分布区。据1935年统计,北京、上海、南京、天津4个城市有基本会员259人,占个人会员总数的51%;4个城市的核心会员为41人,占核心会员的64%。国内名誉会员100%在上述城市生活或工作。1947年的统计,由于战争期间政治中心转移到重庆,会员向大城市集中,在1935年4个城市的基础上,增加了重庆,5个城市有基本会员371人,占个人会员总数的52%;南京、北京、上海的理事、监事委员会委员11人,占44%,国内名誉会员亦100%生活和工作在上述城市。赴美国、英国、法国留学或工作的会员也大多数来自于上述区域,该区域的学者数量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地区,为图书馆学者分布的密集区。

(2)一般分布区。据1935年的统计,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河北、福建、山西、安徽、山东各省有个人会员10—40人不等,9省共有会员197人,占基本会员的39%。除河北、安徽没有核心会员外,其他各省共有核心会员14人,占全部核心会员的18%。据1947年的统计,江苏、广东、浙江、湖北、福建、四川、江西、陕西各省个人会员有10—60人不等,8省共有会员245人,占基本会员的34%,江苏、广东、浙江、湖北、福建与1935年分布一致,河北、山西、安徽、山东退出第二梯队,增加了四川、江西、陕

西,这主要是因为河北、山东在抗战期间成为沦陷区,山西成为战场,大批图书馆员撤往西南的四川、西北的陕西等地,抗战胜利后,有的滞留原地未及复员,有的就地工作。理事、监事委员会委员的分布,除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是1935年分布的共有区域外,增加了甘肃、四川,共11人,占委员总数的44%,远高于1935年的核心学者分布比例,说明经过抗战,图书馆核心学者的分布范围更为广泛。

(3) 稀疏分布区。据1935年的统计,四川、广西、河南、江西、陕西、湖南、云南、贵州、辽宁、绥远等省的会员都在10人以下,10省仅有34名会员,占会员总人数的7%。除四川、河南、江西各有一名核心会员外,其余省份没有核心会员,仅占核心会员总数的4%。据1947年的统计,广西、河南、湖南、云南、贵州、辽宁、山东、山西、河北、甘肃、吉林、西康、台湾等省的会员都在10人以下,13省共有74人,占个人会员的10%。除广西、河南、湖南、云南、贵州、辽宁保持不变外,河北、山东、山西落入第三梯队,甘肃、吉林、西康等省的会员从无到有,有所进步。可喜的是,台湾有学者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和监事委员会委员有2人在甘肃,占8%。

(4) 无会员分布区。按1935年全国有28个省、2个地方计算,甘肃、新疆、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西康、宁夏、青海、西藏、外蒙古11省区没有个人会员。1947年全国设35省,按此计算,热河、察哈尔、绥远、西康、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外蒙古、辽北、安东、合江、松江、嫩江、兴安15省没有个人会员。除甘肃、吉林、西康进入第三梯队外,基本延续1935年的格局。

2.3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的地域分布特征

从1935年、1947年会员分布情况来看,尽管跨度为12年,仍然呈现出一些共性和规律。

第一,分布很不平衡。虽然从东北的辽宁到西南的云南、贵州都有图书馆协会会员,但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会员主要密集分布于北京、上海、南京、天津、重庆等大城市,而一般分布区主要是东部、中部省份,全国90%的会员集中在密集分布区和一般分布区,与该地区图书馆的发达程度成正比。

第二,会员相对集中。会员主要分布在4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分别是以上海、南京以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为核心的华东地区,以北京、天津以

及河北、山西为核心的华北地区,这两个区域的会员人数最多。此外,还有以广东为核心的华南地区和以湖北为核心的华中地区,这两个区域的会员人次多。受战争因素影响,四川、重庆的会员人数异军突起,但仍没有改变整体格局。

第三,分布范围扩大。1935年,会员的一般分布区集中在华东、华北、华中、华南地区,1947年,一般分布区除原有区域外增加了西南的四川和西北的陕西,区域有所扩大;1935年,核心会员在密集分布区的比例远高于一般分布区,而1947年,理事和监事委员会委员在密集分布区和一般分布区的人数持平。1935年,稀疏分布区的个人会员和核心会员比例较低,1947年,稀疏分布区个人会员和理事、监事委员会委员的比例均高于1935年。这些都说明,学者的足迹已经在向偏远地区扩散,抗战期间对西南、西北的开发,促进了这些区域文化事业的进步。

第四,从东到西快速递减。会员学者的分布总体呈现从东南沿海和传统经济发达地区向中部、西北、东北地区扩散和快速递减的趋势。华东、华北会员较为集中,处于中部的湖北、湖南以及偏西的云南、贵州等依次递减,西北、东北一些省份没有会员,递减速度加快。

3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地域分布的成因

3.1 经济因素

图书馆学者的分布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学者分布的不平衡。经济的发展对于图书馆的普及和学者参与图书馆活动有明显影响。直辖市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上海自晚清开埠以来,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经济的繁荣促使城市贵族的崛起,学习文化、到图书馆读书成为新的时尚。北京作为故都,南京作为新首都,是传统的和新兴的经济聚焦点。华东、华北、华南、华中相较全国来说经济也较为发达,尤其是江浙一带,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区。近代经济的发达,提升了人们对西方科学的认同和容纳心理,加之浓厚的经世致用传统和学风,使得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中国近代化图书馆起步最早的地区,也成为近代图书馆学者的摇篮。在解决了基本生活需求以后,人们会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这也促使这些地区的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个人创办图书馆。

3.2 政治因素

图书馆学者的分布与政治变迁有直接关系,国家的政治中心一般也是学术中心,学者往往会随着政治中心的变迁而流动。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能够吸引大量人才。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北洋政府定都北京,图书馆学者和热心图书馆事业的专家学者云集北京,或直接参加图书馆工作,或在政府部门及教育机构任职,从旁协助图书馆学者,使北京的图书馆事业盛况空前。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部分学者随之迁居南京,带动了南京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移都重庆,大量文化机构、社团组织、名人、学校被迫内迁,众多学者随之迁往重庆,在1939年的调查中,作为陪都的重庆市和大后方的云南省图书馆学者最多。在1947年的调查中,重庆市和四川省的会员仍然很多。华东、华北、华南、华中有中国最大的城市,除上海、南京和北京、天津外,华南的广州、华中的武汉也是区域政治中心,聚集了大量人才,这也是图书馆学者比较集中的重要因素。

3.3 文化因素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地域空间,其地方的文化特质、文化积淀也各不相同。考察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分布规律,会发现其与当地的文化特色有密切关系。以上海、南京、江浙为代表的华东地区,具有人口密度大、外来人口多等特点,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作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人们接受新式图书馆的观念较早,学者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新生事物的意识较强;以北京、天津、河北为代表的华北地区是传统的文化区,文化实力雄厚,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众多高等学府诞生于此,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摇篮,为图书馆学者的生存和活动做好了文化铺垫。而西北地区地域广阔、交通不便、人口相对稀少和分散,这种特殊的环境形成了小范围、小规模文化发展的特点,使其文化相对封闭,观念变化相对缓慢,不利于新式图书馆观念的交流和传播。

3.4 教育因素

读书首先要识字,教育是图书馆的先导。东部是教育发达之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华北、华东、华中地区,1922年之前,西南、西北、东北甚至连一所国立大学都没有,1925年全国有国立大学21所,其中北京10

所,上海3所,南京2所,武汉2所,天津、唐山、成都、西安各1所,西南、西北分别只有1所国立大学。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创建在武汉,吸引周边地区的学生就读,毕业后留在学校所在地周边工作,提升了华中图书馆的影响,也使该地区的图书馆学者相对活跃。各地区的中学教育的分布也呈现出不平衡状况,统计显示,1933年在中国每万名人口中,中学生的比例按排名来看,排名首位的南京是排名末位的新疆的378倍,即便是处于中位的河北省与南京市相比,也相差23.7倍^[31]。全国各地接受中等教育以上的人数分布严重失衡,这直接影响了各地文化教育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图书馆的发展,限制了图书馆学者的活动。

4 民国时期改善图书馆学者地域分布失衡状态的经验

图书馆学者群体的分布与图书馆的分布成正相关。中国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学者的分布,受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教育因素的影响,全国各地发展的不均衡,决定了当地图书馆的有无和水平以及图书馆学者群体的活动。从近代至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始终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华东、华北、华南、华中是图书馆的兴盛区,西南、西北是衰微区,其他地区处于中间状态,学者群体的区域分布与图书馆的分布相同。尽管在抗战期间,云南、四川作为大后方,图书馆学者曾短暂聚集,但抗战胜利后,学者群体随图书馆回迁东部,西南又恢复了以往的格局。

为了调节全国图书馆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中华图书馆协会作为行业组织,集中群体力量,积极促成在西北、西南建立国立图书馆。西北图书馆始建于1943年,当时国民政府参政会通过提案,“为了提高该地区民众的文化水准,保存西北文献,提供图书阅览,并开展图书教育”,拟请政府在西北组织大规模图书馆。1943年2月教育部批准通过了该提案,1944年7月7日,西北图书馆正式开馆,刘国钧任馆长。由于在抗战的最后关头,国民政府财力匮乏,教育部于1945年4月下令暂停运营西北图书馆,于6月将其关闭^[32]。抗战胜利后,中华图书馆协会向教育部建议:“抗战业已胜利,今后复员建国,尤当注意教育文化之普遍发扬,而西北交通不便,文化素衰,亟待复兴,故特呈请教育部恢复西北图书馆,以

奠西北文化事业之基础。”同时还建议：“我国国立图书馆，现仅北平与中央两所，本会以图书馆之建立对于专门学术研究与一般社会教育均有莫大帮助，而惟有国立图书馆始可具较大规模，收较大成效，故又呈请教育部于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及原设之国立图书馆，则请教部于其经费与事业方面尽量予以充实与提高，俾得收更大成效。”^[33] 教育部采纳了协会的建议，于1946年9月恢复西北图书馆，改为国立，馆长仍由刘国钧先生担任，1947年2月改为国立兰州图书馆。同月，西北的另一所国立图书馆——国立西安图书馆开始筹办，1947年5月西南重庆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阅览室开放。1947年6月间，教育部从南京、上海等地向国立兰州图书馆调拨各类图书近10万册，大大丰富了该馆的馆藏。通过这些努力，使西北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者构成有了改善。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专业学者从整个国家图书馆事业的高度考虑发展大计，影响了国家决策，使全国图书馆区域分布的失衡状态有所改善。

学者以个人魅力凝聚学者群体的力量，可以带动一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个好的馆长可以带领全体馆员勇于进取，不断创新，反之则可能导致图书馆停滞不前，甚至衰退。中华图书馆协会在给教育部的行文中充分肯定了刘国钧馆长的作用，肯定西北图书馆“以交通困难，经费短绌，以致购置图书未富，但馆长刘国钧氏努力推进馆务，颇著成效。”西北虽为落后之地，但刘国钧以自己在图书馆界的影响，在西北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到1944年6月，刘国钧已经聘请了各种职员32人，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主任何日章被聘为总务组主任，原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主任沈学植被聘为采集组主任（后未到职），另聘周克英、章荪、何锡暇、林锡麟、曹慕樊、张祯琳、卢善昭等多人任编纂、干事等职。1945年初，刘国钧联络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省立兰州图书馆等单位，联合发起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得到图书馆学者的热烈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单位会员增至40家，个人会员达到80余人，这在西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极大地推动了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南京成长起来的学者刘国钧在抗战胜利后仍然愿意留在西北，为开发西北作贡献，也是不可多得的，体现了图书馆学者的精神。

国家调控是平衡图书馆及图书馆学者分布失衡的重要手段。由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者分布的失

衡，分布较多的城市和区域民众利用图书馆更为方便，学者开展学术活动更为积极，使这些城市和区域的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活动形成良性互动，进而促进该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学者的成长。而相对薄弱的西北、西南地区缺乏这种良性互动，使东部和西部图书馆的发展始终存在距离，阻碍了图书馆学者的流动。作为提高全民素质的图书馆，政府在鼓励各方力量创办图书馆的同时，还需要运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均衡图书馆的分布，使自然生长与政府调控并举，让全体国民有均等的接受文化熏陶的机会，以防止“马太效应”和恶性循环。如果不协调图书馆及图书馆学者的分布，东西部的良性互动难以建立，学者流动难以实现，最终将影响图书馆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 1 沈祖荣. 沈祖荣文集[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13-20.
- 2 许晚成. 全国图书馆调查表[M]. 上海: 龙文书店, 1935: 8.
- 3 杨家骆. 图书年鉴[M]. 上海: 词典馆, 1935: 1-401.
- 4 全国图书馆调查表[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5, 1(3): 7-19.
- 5 全国图书馆调查表[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8, 4(2): 7-20.
- 6 全国图书馆调查表[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0, 5(5): 5-34.
- 7 全国图书馆调查表[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1, 7(3): 3-44.
- 8 中华图书馆协会编. 全国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调查表[M], 1935: 1-60.
- 9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 全国公私立图书馆一览表[M], 1930: 1-180.
- 10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 全国公私立图书馆一览表[M], 1936: 1-274.
- 11 浙江省立图书馆编. 全国图书馆一览[M]. 杭州: 浙江省立图书馆铅印部, 1931: 1-122.
- 12 申报年鉴社编. 申报年鉴[M]. 上海: 申报馆, 1936: 1237.
- 13 申报年鉴社编. 申报年鉴[M]. 上海: 申报馆, 1936: 1239-1245.
- 14 中华民国教育部. 中学规程[J]. 杭州市政府教育周刊, 1934(167): 197-199.
- 15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1120-1123.
- 16 黄警顽序. 见: 许晚成. 全国图书馆调查表[M]. 上海: 龙文书店, 1935: 序言页 2.
- 17 许晚成. 全国图书馆调查表[M]. 上海: 龙文书店, 1935: 1-361.
- 18 璩鑫主 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 学制演变[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628.
- 19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1471-1475.
- 20 许刘英.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学者群体及其特征[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2(3): 117-123.

- 21 中华图书馆协会组织大纲[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5, 1 (1):3-4.
- 22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务报告[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6-1944.
- 23 中华图书馆协会个人会员录[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5, 11 (2):20-31.
- 24 中华图书馆协会委员会规程[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5, 1 (2):3-4.
- 25 中华图书馆协会职员表[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5, 11 (2):9.
- 26 中华图书馆协会名誉会员录[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5, 11 (2):10.
- 27 [29][30]中华图书馆协会个人会员名录[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48, 21(3,4):附页.
- 28 中华图书馆协会三十三年度工作报告[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44, 18(5,6):12.
- 31 王伦信.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1:150-153.
- 32 杨玉麟. 民国时期“国立西北图书馆”史料订补[J]. 图书与情报, 1996(4):76-77.
- 33 本会呈请教部恢复西北图书馆并增设国立图书馆[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45, 19(4,5,6):13.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84

收稿日期:2016年8月22日

Study on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Library Scholars in the Republic Period

Wei Qingyuan

Abstract: Statistically analyzing the libraries in the Republic Period fou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ibrary scholars was seriously unbalanced between the region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unbalancing was influenced by the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library professionals on the national policy helps to improve the unbalance. The cohesive power of the famous library scholars c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cause of the local area. National regulation is the important way to balanc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ibraries and library scholars.

Keywords: The Republic Period; Library; Group Scholars; Regional Distribution

(接第 127 页)

A Survey of Cao Zubi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Library Science

Huang Xueting

Abstract: Cao Zubin is well-known for his post of library director of both Sichuan Provincial Library and Nanking University Library, Library Science teaching in Jiling University, as well as his works of *Nanking University Library Series Subheading Index*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of China.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is no special study on his studying and working experience as well as academic contribution. The paper firstly explores his life and working experience, and then elaborates hi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bibliography achievements and organizations and activities in librarianship.

Keywords: Cao Zubin; Library of Nanking University;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Library Scientist; Bibliography